

《金光明经》版本流变

萨仁高娃

作者简介：萨仁高娃，女，1972年生，内蒙古人。200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献整理、编目与研究。

内容提要：传世汉文《金光明经》有北凉县无谶译四卷十九品本ⁱ、隋大兴善寺沙门宝贵综合各家译本删同补缺成的八卷二十四品合部本、武周长安三年义净译十卷三十一品本。敦煌遗书中亦有多件《金光明经》，然与大正《大藏经》(16)所收本比较，结构方面有所差异。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中，有于阗文、西夏文、藏文、蒙文《金光明经》。西夏、藏文本均译自义净本，而蒙文则译自藏文本。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夏文《金光明经》前有通常北凉县无谶本前才出现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以使译自义净本的西夏文本更加复杂。蒙、藏文本除了十卷三十一品外，还有只见于此两版本中，直接译自梵文本的十卷二十九品本和五卷二十一品本，除外还有总括十卷二十九品本而成的略《金光明经》。无论是汉文本，还是少数民族文字本，追究其根本，应都是梵文本，然所看到的各文种本卷次不同、长短不一，说明梵文本具有多种形式，正如S.720《金光明经卷第七》尾记所述“此品咒法，有略有广，或开或合，前后不同，梵本既多，但依一译，后勘者知之。”而敦煌本的出现，更加丰富了汉文《金光明经》。无论是北凉县无谶本、还是合部本、义净本，内都可分不同类别，甚至有将与《金光明经》相关的内容一同抄录成卷的现象，这足以反映了《金光明经》在民间流传过程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关键词：《金光明经》 汉文本 少数民族文字本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its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Saren Gaowa

Biography: Saren Gaowa, female, born in 1972, from Inner Mongolia. She graduated in 2002 with a doctorate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s minority peoples from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he now works as a deputy researcher at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Research Centre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umbering and cataloguing manuscripts and undertaking research.

Abstract: Extant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include the Northern Liang Dharmaraksha translation in 4 *juan* and 19 *pin*,ⁱⁱ the Sui dynasty combined version of

previous translators' work compiled by the monk at Daxingshan Temple, Bao Gui, in 8 *juan* and 24 *pin*, and the Yijing translation of Chang'an 3rd year (703 AD) in 10 *juan* and 31 *pin*. Many versions of the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can be found among the Dunhuang documents, which are different to the Taisho 16 version. Versions of the sutra in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hel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clude Khotanese, Tangut, Tibetan and Mongolian. The Tangut and Tibetan versions were translated from Yijing's text, whereas the Mongolian version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Tibetan version. According to written sources, the Tangut version based its chapter on confession on the earlier Northern Liang Dharmaraksha translation, making the translation from Yijing's later version even more complex. Apart from the 10 *juan* 31 *pin* of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versions, there are also 10 *juan* 29 *pin* and 5 *juan* 21 *pin* translated straight from Sanskrit and extant only in two editions, as well as the final version in 10 *juan* and 29 *pin*. Whether one is discussing Chinese versions or other language versions, the original sutra was in Sanskrit. Thus the differences of chapters and length of the different language versions indicate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several Sanskrit versions. Indeed the colophon of the 7th *juan* of the Or.8210/S.720 Chinese Sutra of Golden Light testifies to the variety of Sanskrit versions.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has enriched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All versions of the sutra, the Northern Liang Dharmaraksha translation, the combined version and Yijing's translation all hav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text, all of which shows the evolution that occurred as the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was transmitted through society.

Keywords: *Suvarāprabhāsottamasūtra*; Chinese version; Central Asian language versions

《金光明经》，又称《金光明最胜王经》、《最胜王经》，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的佛经之一，梵文称“*avrd. Subrn. Pra bha sad ta msu tren dra rva dzva nva ma mhva yan svu tra*”，旨“若读诵本经，其国即得四大天王之所守护”。该经最早由北凉昙无讖译成汉文《金光明经》四卷十九品；其次为梁真谛译的七卷二十二品及北周武帝时耶舍屈多所译的五卷本；隋开皇年间大兴善寺沙门宝贵综合各家译本删同补缺成《合部金光明经》八卷二十四品；最后则为武同长安三年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三十一品。而义净的汉译本成为《金光明经》民族文字翻译的底本，回鹘文、西夏、藏文和满文《金光明经》均译自义净本。现存的民族文字《金光明经》还有蒙文以及于阆文本。据已故的黄振华先生介绍，自1945年起，英国学者贝利教授将各国所藏大部分于阆文文献转写发表，原件亦陆续影印刊布于世。所发表的《于阆文文献》中就有佛经《金光明经》ⁱⁱⁱ，其图文可参考《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P.3513号^{iv}。近年，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域文献中亦有一件于阆文《金光明经》残片。本文通览敦煌本汉文《金光明经》，并介绍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蒙、藏文本，以比较它们在卷次、内容结构方面的异同。

一、汉文《金光明经》

如上所述，现传世的汉文《金光明经》，有北凉昙无讖的四卷十九品本、隋大兴善寺沙门宝贵八卷二十四品的合部本、唐义净十卷三十一品本。

1、北凉昙无讖本

北凉县无谿本以“金光明经”著称，现所流行本有三类：

一为大正《大藏经》(16)所收本，即前有《金光明经序》，末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简称冥报传)。经文含四卷十九品，分别是：卷第一的序品第一、寿量品第二、忏悔品第三、赞欢品第四、空品第五，卷第二的四天王品第六、大辩神品第七、功德天品第八、坚牢地神品第九，卷第三的散脂鬼神品第十、正论品第十一、善集品第十二、鬼神品第十三、授记品第十四、除病品第十五，卷第四的流水长者子品第十六、舍身品第十七、赞佛品第十八、嘱累品第十九。

二为卷次和品目与大正《大藏经》(16)所收本相同，但前无序，却有冥报传者。此类主要在敦煌汉文遗书中。即：Φ260，完整的经卷，含《金光明经》四卷十九品，前有冥报传，首题“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北1360(藏062)，抄录了卷第一至卷第四的十九品，前有冥报传，但冥报传首残，尾题为《金光明经传》。P.2203，首残，后续《金光明经》卷第一至第四，其中“灭业障品第五”前却记“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谓冥报传，是指张居道入冥的故事，系忏法的一种，属金光明忏法，具有依靠《金光明经》之力量，解脱罪恶之意。其实，敦煌遗书中，北凉县无谿本的凡第一卷序品第一前皆有冥报传，它们是：

北1361(日011)：首尾全，首题“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

北1362(为069)：首题“忏悔(残)”，尾题“金光明经传”。

北1363(成013)：首残尾全，尾题“金光明经传”。

北1364(列055)：首残。

北1365(昃061)：首残，尾题“金光明经传”。

北1366(腾062)：残。

北1367(生099)：首残。

北1368(水039)：残。

北1369(河066)：首残，尾题“金光明经传”。

S.364：首残，尾题“金光明经传”。

S.1963：只存末尾8行。

S.2981：《金光明经》卷第一至四，前有首残的冥报传。

S.3257：首尾全，首题“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尾题“金光明经传”。

S.4155：首残，尾题“金光明经冥报验传记”。

S.4984：首残。

S.6514：首残。

P.2099：首尾残，首题“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尾题“金光明经传”。

敦煌遗书中，还有几个号为单独的冥报传，即：

北1424(海069)：首尾全，首题“忏悔灭罪金光明(残)”，尾题“金光明经传”。此卷尾可与北1368(水039)卷首缀合，成完整的一卷。

北1425(寒077)：首残，尾题“金光明经传”。

北1426(玉055)：首题“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

S.6035：《金光明经冥报验传记》，残存8行。末行“道头及缚居道两手将去直行”。

Ⅱ×2325：存13行。

Ⅱ×4363：冥报传，残，存10行。

Ⅱ×5755：冥报传，残存9行，系开头，首题“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下有“卷一”。

据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日本诸私家藏和未详所藏者中也有两件《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⁹。

北凉昙无讖本共四卷，但敦煌本北 1419（河 085）和北 1423（号 086）的尾题为“金光明经卷第五”，而前者的实际内容是“舍身品第十七至赞佛品第十八”等卷第四的内容，后者为卷第四的赞佛品第十八。

三为首残，既无序又无冥报传的多件敦煌经卷。

2、合部本

合部本是隋大兴善寺沙门宝贵综合各家译本删同补缺成，此本也可分为三类。

一是，大正《大藏经》（16）中收录本。前有《金光明经序》，含八卷二十四品，即：卷第一的序品第一、寿量品第二、三身分别品第三，卷第二的忏悔品第四、业障灭品第五，卷第三的陀罗尼最净地品第六，卷第四的赞欢品第七、空品第八、依空满愿品第九，卷第五的四天王品第十，卷第六的银主陀罗尼品第十一、大辩天品第十二、功德天品第十三、监牢地神品第十四、散脂鬼神品第十五、正论品第十六，卷第七的善集品第十七、鬼神品第十八、授记品第十九、除病品第二十、流水长者子品第二十一，卷第八的舍身品第二十二、赞佛品第二十三、付嘱品第二十四。敦煌本 S.409 和 S.2426 亦属此类。前者《金光明经卷一序品第一》前有 4 行序“（前残）都费长房笔受。通梵沙门（残）彦琮校练。宝珠既足。欣跃载深。（残）之永劫”，并有尾记“经生辅文开抄。用纸廿二张。法师智彦三校。法华斋主大僧平事沙门法焕定。”后者《金光明经卷一序品第一》前有首尾全的“金光明经序”32 行。

二是，卷次与品目与大正《大藏经》（16）收录本相同，前亦有《金光明经序》，但与上述序不一致的敦煌本上图 040。该序全文为“金光明经者。诸经之王也。常命难量。四尊咸证。真如本寂三身。共依具宣忏文郭虽深而可灭略谈空法愿虽大而能满总持净于十地卫护起于四王力尊与善集分功流水将舍身同致弘誓之道众神并发正觉之记唯佛独明赞扬圣德穷微妙之境付属玄宗尽殷勤之说昔者摄摩腾之创至乃傅美名（出高僧传）昙无讖之后来方开幽趣（四卷十八品者）梁时感于真谛四品增译（三身分别品、业障灭品、依空满愿品、陀罗尼最净品）隋世时请于崛多二品续演（银主陀罗尼品属累品）寿量大辩又补其缺究竟此业并是崛多之功讫在开皇十七年也大兴善寺沙门宝贵劝请深至爱翫淳重斯经总集寔赖其人校正而粗周讨真源而略备法灯以兹不尽闻熏于是弥益所愿未来之际永作津梁。”题名“金光明经序”下有题记“大兴善寺沙门彦琮作”。

三是，首残，前无序的敦煌本部分经卷。

3、唐义净本

唐义净本可分为二类。

一为大正《大藏经》（16）所收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所含十卷三十一品为：卷第一的序品第一、如来寿量品第二，卷第二的分别三身品第三、梦见金鼓忏悔品第四，卷第三的灭业障品第五，卷第四的最净地陀罗尼品第六，卷第五的莲华喻赞品第七、金胜陀罗尼品第八、重显空性品第九、依空满愿品第十、四天王观察人天品第十一，卷第六的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卷第七的无染着陀罗尼品第十三、如意宝珠品第十四、大辩才天女第十五之一，卷第八的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之二、大吉祥天女品第十六、大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第十七、坚牢地神品第十八、僧慎尔耶药叉大将品第十九、王法正论品第二十，善生王品第二十一、诸天药叉护持品第二十二、授记品第二十三、除病品第二十四、长者子流水品第二十五，卷第十的舍身品第二十六、十方菩萨赞欢品第二十七、妙幢菩萨赞欢品第二十八、菩提树神赞欢品第

二十九、大辩才天女赞欢品第三十、付嘱品第三十一。

二为前有《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的敦煌本。北 1439（律 54）《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前有首尾全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S.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前有首残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上图 038（81244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前有《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的末尾 8 行；P.2883《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第一并序》，也是首残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序品第一也不完整，只存 4 行。

《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是唐中宗（650—710）赞颂义净译经伟业而所撰的经序。敦煌本中有几号是独立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即：P.3154 号为首尾全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前有一行“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北 2004（制 27）和 P.2899 是首全尾残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前有一行“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北 8408（翔 50）、P.2632、P.2803 是首全尾残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P.293 是首尾残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P.x 2223 是仅存末尾 21 行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

另外，S.462 号由首残尾全的冥报传和首全尾残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组成。可见，《金光明经》或者《金光明最胜王经》在民间流传和抄录时，其形式多发生变化，失去固有的模式，其前或后加与经有关的序以及故事等。即使是同一经，如合部本，其经序也出现了两种形式，甚至，具有将与该经相关的内容一同抄写的现象。

唐义净本虽以“金光明最胜王经”著称，但北 1588 等 75 个号的尾题为“金光明经卷某某”等，若不看其首题，则误认为北凉县无谶本。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我们还能看到除敦煌本外的单行本《金光明经》的传世^{vi}。其中，北凉县无谶本有 8 件，唐义净本有 3 件，还有一件《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一卷》。当然，此目录只收入了年代较早的版本，未收明清本，很难准确把握现所传世的《金光明经》所有单行本。

二、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文字《金光明经》

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文字《金光明经》主要有藏文、蒙文、西夏文和于阗文本。而有关于于阗文《金光明经》，在座的几位老师已经有了精彩的论述，下边主要看藏文、蒙文和西夏文本。

1、藏、蒙文本《金光明经》

由于蒙文《金光明经》是译自藏文，其结构特征与藏文本完全相同，故在此一并介绍。陈寅恪先生早已在《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中指出“西藏文则有三本，其一为法成重译之中文义净本”^{vii}。此处所指三本应该蒙藏文《金光明经》长、中、短三类。

长《金光明经》是指译自汉文义净本的版本。藏文三十一品本开头提“汉文名……藏文名……”，尾记有“zhu chen gyi mkhan po dang/lo catsha ba bcom ldan vdas kyi ring lugs pa na de chos grub kyis rgyavi dpe las bsgyur cing zhus te gtan la phab pa”（汉译：大师、薄伽梵系却珠^{viii}译师译自汉文）。蒙文本开头亦提“汉文名……藏文名……”，并多出蒙文名。按蒙文佛经的传统题名，这显然是译自藏文本，经末有题记“班智达却珠通事译自汉文本。经贡嘎斡节尔^{ix}倡译，喇尔吉译成蒙文。”此版本只见于蒙藏文北京版《大藏经》^x中。当然，蒙藏文本不像敦煌汉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前无《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的译文。其结构与大正《大藏经》（16）所收汉文本完全一致，最明显的是《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的前半部分在卷七中，而后半部分则在卷八中。只是，汉文本把前者命名为“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之一”，后者命名为“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之二”，蒙藏文本仅仅前者有题名，而卷

八中的后半部分则无题名。

中《金光明经》是指十卷二十九品本，为译自梵文本，只见于藏、蒙文本中。藏文本开头提“梵文名……藏文名……”，藏文北京版《大藏经》所收本尾记为“ban ti ta dzi na mi dra dang/shi lan dra bo nghi dang//zhu chen gyi lo tsatsha ba ban nghi ye she stes bsgyur cing zhu te//skad gsar chad kyis gtan la phab pa//”（汉译：大译师也协德^{xi}翻译校订）。蒙文本的开头一般是“梵文名……藏文名……蒙文名……”，其译者是14世纪著名通事希儒僧格^{xii}。其具体品目为：卷第一的序品第一、如来寿量品第二，卷第二的分别三身品第三、梦见忏悔品第四；卷第三的灭业障品第五，卷第四的净地陀罗尼品第六，卷第五的莲花喻赞品第七、金胜陀罗尼品第八、重显空性品第九、依空满愿品第十、四天王观察人天品第十一，卷第六的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卷第七的无染着陀罗尼品第十三、如意宝珠品第十四，卷第八的大辩才天女品第十五、大吉祥天女品第十六、大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第十七、坚牢地神品第十八、僧慎尔耶药叉大将品第十九、王法正论品第二十，卷第九的养生王品第二十一、诸天药叉护持品第二十二、授记品第二十三、除病品第二十四、长者子流水品第二十五，卷第十的舍身品第二十六、十方菩萨赞叹品第二十七、妙幢菩萨赞叹品第二十八、付嘱品第二十九。此类版本不仅收于藏、蒙文《大藏经》^{xiii}，其单行本的流传也非常广泛。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古籍中，有四件单行本，即：

4198：亦是北京版，计200叶，12×47.5cm。前两页是朱写，第一、二、三、四页分别是三、四、五、六行字，其余则均是七行。

4319-1：是北京新版，计203叶，8×38cm。头两页为朱写，第一、二页为五行，其余均为八行。

4444：是北京版，计198叶，11×47cm。第一页为三行，第二页为四行，第三页为五行，其余皆为七行。

5206：是塔尔寺版，计180叶，7×48.5cm。头两页为四行，其余均为六行。

蒙文单行本有五件：

0029：是清刻本，单栏，共224叶，每页37行，50×10cm。首两行为朱书。

0126，是清抄本，单栏，共119叶，每页29行，22.5×65cm。第一页缺残，每页字迹的特点是前七行为墨书，中间三个五行分别是红、黑、红交替，最后七行亦是墨书。

0229，清代金字写本，共151叶，每页39行，宽17cm，长63.7cm，厚13.7cm。有佛像和附图，结尾处有二十六行梵文。长方形散页两面用竹笔书写。双栏，内画框廓，从左至右，书写经文，左上角有蒙文卷页次，右侧则以汉文译经卷目录。该藏品是在磁青纸上用泥金抄的手写本，经书四侧均绘有云头花纹，质厚且韧，外观精美，是公认的精品。

0525，是清中期刻本，单栏，共227叶，每页31行，12.2×42.2cm，有佛像和附图。页码均用藏文字母“ka”、蒙文“ka”和汉文“利”标识。经末附有两首诗《qutu ṽ -tu sain yabudal-un irüger -un ka ṽ an》（藏文为 vphags pa bzang po skyod pavi smon lam gyi rgyal po）和《dolu ṽ an ülemji burkan-u öljei-tü qutu ṽ -tu šilüg》（藏文为 sangs rgyas kyī rab bdon bai bkra shis tshig su btsad pa）。该藏品在内蒙古社科院图书资料中心也有一份。

0540，是清乾隆四年（1665）的刻本，共221叶。该版的开头分别用梵文和藏文刻了《金光明经》的梵、藏名字，结尾说明该版是“清乾隆四年甲巳年秋初月初七开始，本年秋末月二十五日刻毕”。而页码则用汉文的“财、源、茂、盛、川、流、不、息、大、吉、利”和蒙文的“一、二、三”来标注。

短《金光明经》则是五卷二十一品本，也只见于藏、蒙文《大藏经》，不见于汉文中。由于国家图书馆藏缺藏文北京版《大藏经》的《秘密经》（14卷），所以很难看到其具体经文，而所藏的藏蒙满汉四文种合璧《大藏经总目》的藏文目录中记载“rgyud kyi pha dum bcu bzhi la/vphags pa gser vod dam pa mdo sdevi dbang povi rgyal po zhes bya bavi theg pa chen povi mdo”^{xiv}（汉译：秘密经十四卷：圣金光明最胜王大乘经），显然有《金光明最胜王经》。据蒙文北京版《大藏经》^{xv}，其具体卷次和品目是：卷第一的如来寿量品第二、梦见忏悔品（第三、第四），卷第二的莲花喻赞品第五、重显空性品第六、（缺品第七），卷第三的大辩才天女品第八、大吉祥天女品第九、坚牢地神品第十、僧慎尔耶药叉大将品第十一，卷第四的王法正论品第十二、养生王品第十三、诸天药叉护持品第十四、授记品第十五、除病品第十六，卷第五的长者子流水品第十七、舍身品第十八、十方菩萨赞叹品第十九、妙幢菩萨赞叹品第二十、付嘱品第二十一。其开头亦是“梵文名……藏文名……蒙文名……”，也许藏文本亦是译自梵文本，而蒙文本译自藏文。

据有关资料记载，除上述三类外，蒙藏文本中还有略《金光明经》，“经末有题记称丹巴多杰总括中《金光明经》而成。”^{xvi}。国内，看不到此本，蒙古学界认为所提丹巴多杰同于《目键连救母经》的蒙文译者，是14世纪时期著名通事。

放眼看敦煌吐蕃文卷子，王尧先生《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xvii}中录入Pt.0063等36个号《金光明经》吐蕃文写卷，其中15个号题名为《金光明经》。如果这是北凉县无谿本的藏译本，则恰好弥补现传世藏文古籍中无此版译本的缺憾。

2、西夏文《金光明经》

西夏文《金光明经》为译自义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专家史金波先生根据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金光明经》之序言“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xviii}，推论西夏文《金光明经》的译者为西夏时期的高僧白智光，译经年代为西夏惠宗在位时期（1068—1087年）。此基础上，杨富学先生对这位著名高僧进行考证，认为他是回鹘人^{xix}。

据史金波先生的整理情况看，国家图书馆藏的西夏文《金光明经》具体卷次为：卷一两件，索书号分别是1.03和1.04；卷三一件，索书号为1.05；卷四两件；索书号分别是第九件和1.06；卷五有五件，索书号分别是1.07、1.02—1、1.08—1；两件卷六，索书号为1.09和1.10；卷八的索书号是1.11；卷九为1.12；两件卷十分别为1.13和1.14。可见，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西夏文《金光明经》缺卷二、卷七。据胡进杉先生的介绍，国家图书馆寄存于故宫博物院的西夏文刊本中有两册《金光明经》，是卷七和卷九，均为经折装。“卷七，首尾完具，封面题签具存，卷首扉画二页，次像记一页，次经文34页半；卷九，首尾完具，封面题签佚，卷首扉画二页，次像记一页半，次经文42页半，上下双栏，每半页版框高19.1公分，宽10.1公分，六行，行16字，平均五个半页为一版，两版接缝处，有汉文「金光卷几」、「金光几」及「几卷尾」字样，下记版数，无刻工姓字，二册均刷印于薄毛遍纸上，墨色清晰，笔画峻利，锋稜毕现，结字方整，但卷九第九版，则壁画圆润，书体流利，异于他版，或为其他刻工书手所为。”^{xx}这正与周叔迦先生所言“西夏文《金光明经》共有十卷，缺卷二”^{xxi}相符。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藏一部泥金字《金光明经》西夏文佛经。据有关资料介绍，它是十三世纪初的写本。“残存18面，上下双栏，紫青色纸，质厚且韧，字用金泥写成，书法精绝。经文包括《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第五和第十的部分断片，可推知原本为十

卷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完本。经末有西夏第十八皇帝神尊项的一篇御制发愿文，共十二行，行 24—25 字，文末有‘光定四年’（1214 年）年款。文中叙述此经译后校正经过颇详。是研究西夏译经史的重要文献。”1982 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共同发表《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史金波、白滨执笔），介绍了这一文献，翻译了发愿文，并论述了它的重要学术价值^{xxii}。

陈寅恪先生在其《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中指出“所见敦煌本中文金光明经冥报传（合肥张氏所藏）西夏文之译本（北平图书馆藏）及畏兀吾文译本（俄国科学院佛教丛书第一七种），皆取以冠于本经之首。吐蕃文金刚经冥报传（一千九百二十四年普鲁士学院哲学历史组一七报告），虽残缺不完，以体例推之，应亦相同。斯盖当时风尚，取果报故事与本经有关者，编列于经文之前，以为流通之助。”^{xxiii}“借相关的果报故事推动《金光明经》流通的做法，或起始于汉地释门，吐蕃、回鹘、西夏各族释门随后从而效之”^{xxiv}。可见，回鹘文、西夏文等本虽然译自义净本，但其前均抄录仅在北凉县无谶本前才出现的冥报传，致使《金光明经》版本形式更加复杂。然而，以上的少数民族文字本大多都译自汉文义净本，没有资料称译自北凉县无谶本或者合部本的消息。据聂鸿音先生及其学生的发现，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中有译自北凉县无谶本的残卷，相信在此次座谈会中给我们带来惊喜的。

总之，《金光明经》的版本众多，流传形式极为复杂。光传世的汉文本就有三大类，而同类中其结构特征也不尽相同，这主要是由于敦煌本和少数民族文字本的掺入造成的。如果，只看《大藏经》所收的汉文本，其形式却非常简单，但以民间抄写为主的敦煌本和以汉、梵、藏文本为底本，翻译而成的少数民族文字本的出现，使我们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多种版本。无论是北凉县无谶本，还是合部本、义净本，由于敦煌本发现，我们看到了众多不同的形态，这足以说明无论是正经，还是疑伪经，在民间流传和抄录时，虽其经文和大概轮廓不变，但前后结构却发生变化。民间流传本大多是认为“多多益善”，把与经文相关的内容都叠加在一起。而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本时，情况发生更大变化。就如各位学者所介绍的回鹘文和西夏文本，虽然均译自汉文义净本，但把常出现于北凉县无谶本前的冥报传补译进来，形成了与汉文本完全不同的版本。蒙、藏文十卷三十一品《金光明经》，虽然译自义净本，但不像敦煌本所收义净本般，前有《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这方面与大正《大藏经》（16）本相同。译自梵文的蒙、藏文本为二十九品，说明其底本也是二十九品。据国家图书馆藏北 1751（雨 39、BD03339）《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尾记^{xxv}，含三十一品的义净本也是译自梵文本，以及所述蒙藏文五卷二十一品本也是译自梵文，那么我们由先传世的《金光明经》版本来看，梵文本至少有四大类，即四卷十九品本、五卷二十一品本、十卷二十九品本和十卷三十一品。这正吻合 S.720《金光明经卷第七》尾记所述“此品咒法，有略有广，或开或合，前后不同，梵本既多，但依一译，后勘者知之。”

i 学界一直认为北凉县无谶本为四卷十八品，而大正《大藏经》（16）、《中华大藏经》（67）以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本北 1360（藏 62、BD02162）均是四卷十九品本，第十九品为《金光明经嘱类品》，故在此说四卷十九品。

ii Scholars have always considered the Northern Liang Dharmaraksha translation to have 4 juan and 18 pin, whereas Taisho 16, Zhonghua Dacangjing 67 and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manuscript BD02162 (Bei 1360) all contain 4 juan and 19 pin, the 19th pin is the chapter on exhortation/praise from the Suvarṇaprabhāsottamasūtra.

iii 黄振华《于闐文研究概述》，见杨富学、杨铭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一），甘肃文化出版

社, 1999年。

iv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5,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104页。

v 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分别是第335页和338页。

vi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第904—995页。

vii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257页。

viii 又称管·法成, 系9世纪人, 出生于后藏达那地区, 精通藏、汉文和佛学, 于9世纪20年代左右到达敦煌地区后, 相继在沙州和甘州一带传法译经, 在敦煌地区共活动了四十余年。在沙州永康寺和甘州修多寺等地先后翻译了大量的经典。其中, 译自汉文的藏文经典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亦称《入楞伽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十五部; 译自藏文的汉文经典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和《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还著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等著作。

ix 十七世纪蒙古著名学者, 1628—1629年间, 曾主持翻译蒙文《甘珠尔》。

x 蒙藏文北京版《大藏经》, 《秘密经》(卷13), 第12经。

xi 《红史》中记载, “赤松德赞从十三岁起执政四十三年, 迎请印度的堪布喜瓦措、莲花生大师、毕玛拉迷扎、首底嘎拔、毕苏达恩哈、达玛格底则那迷扎、达哈那西拉、喇玛拉锡拉和汉地和尚玛哈衍那等, 由毕若扎那、嘎瓦贝则、属庐鲁易坚赞、班第益希德等人任译师, 翻译无数经典。” xi译师也协德除了翻译《金光明经》外, 还翻译了《诸种见之分别》(lta bavi khyad par)、《普贤行愿品四家注集义》(bzang spyod kyi vgrell pa bzhivi don bsdu)、《成他世论》(vjig rten pha rol sgrub pa)、《四种秘密意笔记》(dgongs ldem dgongs bzhivi brjed byang)等。

xii 有关希儒僧格(1323—1367)的信息很少, 仅从零散资料得知他字滌, 号静庵, 高昌人。曾翻译《释迦牟尼十二圣迹记》、《五大陀罗尼》等著名佛经。《蒙古源流》等史料记载“其后噶玛拉之子也逊帖木儿合罕, 癸巳年生, 岁次甲子, 年三十二岁即位, 命萨斯嘉·布尼雅·巴达喇嘛及蒙古师锡喇卜僧格通事二人, 翻译前所未译之诸经。”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件清初竹笔写本有题记“蒙古通士希儒僧格译自藏文并根据汉文命名为《kutu y tu degedü altan gerel-tü ereketü sudur nu y ud-un qa y an neretü yeke kölgen sudur》”。

xiii 蒙藏文北京版《大藏经》, 《秘密经》(卷13), 第13经。

xiv 藏蒙满汉四文种合璧《大藏经总目》, 藏文目录“上四”页。

xv 蒙文北京版《大藏经》, 《秘密经》(卷14), 第1经, 1—85页。

xvi [蒙古]策·达木丁苏荣编《蒙古古代文学一百篇》(第二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年。584页。

xvii 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 民族出版社, 1999年。

xviii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 《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xix 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2004年。

xx 胡进杉《西夏文刊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两幅扉画》, 《法光学坛》2002年第六期。

xxi 周叔迦《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

xxii 《文物》1982年, 第4期。

xxiii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176页。第256页的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中也提此意。

xxiv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绪论第20页。

xxv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69),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年。第597页。